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陈晓律 著

1500年以来的 英国与世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2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项目

陈晓律 著

1500年以来的 英国与世界



重庆科技学院图书馆



1305275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500年以来的英国与世界/陈晓律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ISBN 978-7-108-04168-5

I. ①1… II. ①陈… III. ①英国—历史—研究 IV. ①K56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0485号



责任编辑 麻俊生

封面设计 路 静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张21.75

字 数 330千字

定 价 64.00元

百年传承铸学魂(总序)

南京大学历史系有两个源头。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两江总督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商议办学事宜,旋即上《奏陈筹办学堂情形折》,其中称“江南地大物博,素称人文渊薮。省会高等学堂规模必求宏敞,俾可广育人才”,是为三江师范学堂开办之始。刘坤一未几即病逝,其继任者为洋务派名臣张之洞。张之洞再上《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清廷准奏。1903年9月,三江师范学堂在前明南京国子监旧址开学,设有历史科,学制4年,此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之肇始。之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国史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历史科、东南大学文理科史学系、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等阶段。

1888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南京干河沿创办了汇文书院(The Nanking University),由学贯中西的美籍加拿大传教士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担任院长。1910年,汇文书院合并位于南京的另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宏育书院(1907年由基督书院和宏智书院合并而成),金陵大学堂(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因此正式成立。金陵大学建立之初即设有历史学科。

自1903年至1949年,历经4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从蹒跚学步的婴儿成长为英俊彪悍的壮汉,虽历经风雨,但其长期积淀形成的学术传统赓续不断,蜚声海内外。1952年院系调整,原中央大学史学系、边疆政治系和金陵大学历史系合并,形成现

今学术底蕴深厚的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基本学科架构。

110 年来,南京大学历史学大师辈出,柳诒徵、徐养秋、陈汉章、雷海宗、郭廷以、朱希祖、金毓黻、沈刚伯、贺昌群、缪凤林、蒙文通、商承祚、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郑鹤声、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陈恭禄、陈登原和王伊同等,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严谨求实”学风的确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南京大学历史系培养的学生已超过 6 000 人,其中本科、专科生逾 4 000 人,硕士、博士研究生 2 000 余人,他们或为学界翘楚,或为政界精英,或为商界巨擘,群星璀璨。如 1923 年毕业的南高师国文史地部第三班,即走出了著名史学家缪凤林和向达,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和张其昀,以及著名图书馆学家陈训慈。此外,著名历史学家束世徵、郭廷以、王聿均、唐德刚、吴天威、章开沅、李时岳、王觉非、蒋赞初、茅家琦、梁白泉、张宪文、陈得芝、魏良弢等,均为本系毕业生。

学衡派是南京大学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而历史系教授则为其学术中坚。柳诒徵先生所阐述的《学衡》杂志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①在《学衡》杂志的旗帜下,一群以本国固有文化为根本的学者,展开实证研究。对于国学,他们主张“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他们主张“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反对“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②学界对于学衡派“攻击新文化运动”、“复古倒退”的传统定论显然并不公正。现在看来,学衡派所倡导的兼采中西文化之长的观点,倒是显得更加理性。历史已证明,《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主张和追求,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学衡派的为学宗旨和治史方法,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1952 年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历经政治运动的冲击,师资与学科结构遭受了重创,但学术传承却从未间断。在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陈恭禄、王栻、刘

①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 1 期(民国十一年 1 月)。

②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 1 期(民国十一年 1 月)。

毓璜、洪焕椿、茅家琦、王觉非、蒋赞初、陈得芝、魏良弢、蔡少卿、张宪文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引领下,形成了今天的学科结构与科研格局,也源源推出了影响中国史学进程的良史佳作。

为推动学术发展,总结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成果,激励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人潜心治学,我们编集了这套《南京大学史学丛书》,以图继往开来,克绍箕裘,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必须强调的是,这批丛书仅仅是南京大学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的展示。

2010年4月20日,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樑先生与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教授签署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协议,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和南京大学“985三期”项目按照1比1.5的比例,共同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资助南京大学的人文学科建设。《南京大学史学丛书》得到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全额资助,谨此鸣谢。

陈谦平

2013年1月于南京

序 言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命运似乎总是与“历史”有关。这里的“历史”之所以加上引号,因为它特指 1949 年以后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与共和国的成长休戚相关。很多时候,只要问一下年龄,那么,对方的人生经历,也就大同小异,像填写表格一样呈现出来。这种程序化的人生经历,固然并不丰富多彩,但也给我们涂上了某种底色。身处变革的时代,我们或许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不知不觉间竟然养成了一种关心国事的习惯。不过命运似乎总是喜欢跟我们开玩笑,我们尚未成年就被作为“知青”送到了广阔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事后看来,这的确是一段蹉跎岁月,但也让一个城市青年,真正地体验到了中国农村的极端贫困。一天累死累活,不过一两毛的收入,而一年的口粮分配,连上带壳的五谷杂粮,也就两三百斤。什么是中国国情,或许也就在这时,才开始有了不是书上而是自己亲身体验得来的认知;同时,也很自然地在实践中有了自己评价“艰苦”的标准。当然,越是这样,就越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尽快走上正轨,迅速迈入“四个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因为自己已经开始在朦胧中意识到,国运即家运,只有整个国家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个人的未来才会有希望。只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也不知道自己除了日复一日地“蹉跎”外,还能不能做点其他的什么事情。

1977 年恢复高考总算给了我们这代人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更没有想到的是,我最后竟然能师从著名的英国史大师蒋孟引先生从事英国史研究。蒋先生是原中央大学的教授,20 世纪 30 年代远赴英伦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国内的英国史学界德高望重,能成为他的弟子,实在是几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这种难得的机

遇与恢复高考后,同时开始的研究生招生有关。而全国当时能够招收世界史领域博士生的,只有六位老先生,其中南京大学历史系就有两位。由此也可以看出南大在全国史学界的地位和实力。而我能得到这样老先生的教诲,实在是太幸运了。

在中国现行的教学体系中,除开中国外,其余的国家都属于世界史研究的范围,所以可选择的研究对象很多。众多的国别研究中,美国史是最热的,其原因不言自明。不过,相比之下,英国史却有另一种吸引力。英国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不大,也是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国家,从严格意义上讲,英国还是一个“移民”国家。因为英伦三岛最早的土著,并不是今天英国文明的主要创造者,盎格鲁-萨克逊人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却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成长为世界性的大国和强国,个中缘由是不难引起研究者兴趣的。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但近代却屡受挫折,英国作为近代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西方列强之一,自是中国学人不能不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我有幸作为改革开放后的青年学子,当然对从事这样的研究工作十分容易产生一种本能的冲动。

我自己学习和研究的轨迹,由于各种机缘巧合,也就此与英国连在一起了。首先是对英国的政党政治制度感兴趣,想了解资产阶级政客们是如何轮番上台欺骗百姓的;然后又对其经济制度开始涉猎,因为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国家,普通民众的生活竟然如此富裕,实在与我们教科书上讲的内容差距太大;以后研究的范围又进一步拓展到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文化模式,以及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确立长达 200 多年霸权的历史。这种研究的轨迹,与我相信历史具有某种厚重的“客观性”有关,我想通过不同层面的研究,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最终厘清英国得以崛起的历史脉络,并在这样的基础上,重新解读中国近代的历史。

在经过 10 多年的学习和研究后,我对英国逐步有了新的认识。它能够在近代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国家,与它的区位优势是有一定关系的。不列颠群岛是一个地理位置较为独特的地区,它既能受到欧洲大陆文明进步的影响,又不至于随时受到大陆强权的直接控制。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给英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基础。其次,它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一些相互制衡的因素,也使它能逐步理顺内部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和经济诉求。自近代以来,英国的法治化、民主化、经济现代化、观念现代化、社会保障制度化等进程相互关联、由表及里地层层推进,留下了一条给人印象深刻的历史轨迹。英国的发展,当然不是在真空中,如同一艘航船,它是在一个世界大潮的惊涛骇浪中奋力前行留下的。在这样的航行中,它既需要

打理好自己的航船,创造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同时也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充分把握外部环境的信息,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冷静地选好航路,才不至于在风浪中沉没。换言之,现代意义上的发展,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就是在一个全球化的大海中航行,它要想顺利前行,既需要通过种种变革,调整好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促进自己的发展。如果不能将两者的优势适当地结合起来,它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关注这一问题的同仁也会发现,从1500年成功地发展起来,并始终左右着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欧美大国,其中英国最为典型。因此,英国在开创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同时,如何利用、控制并创造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充分把握发展的机遇,并最终给全球化留下了自己的烙印,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这本文集集中的第一部分的内容,就是与这样探索的努力有关。

实际上,第一部分已经触及到了一个今天非常热门的话题,那就是现代化。因为英国能崛起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它率先实现了现代化。这种领先的优势使它占尽先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得到了远超其他国家的资源和市场份额。

然而,英国能占尽先机,却不能独占鳌头。这是因为,1500年后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世界史,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从这一时刻起都被纳入了“世界”的范畴。正如阿克顿所说,世界史不同于所有国家的历史合并成的历史。各国的发展历史不再是分散的,而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主要国家的意图与其达到目标的能力影响着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而当今世界的基本格局,则是欧洲国家相互争夺这种世界秩序领导权的努力所形成的最终结果。于是,对欧美各国在这场竞争中“表现”的考察和评述成为了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

每一个能够崭露头角的国家都必须有自己绝活或是亮点。一个国家的发展已经不完全是属于自己的事情,它要在这种国家间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抓住时机,超越自己的竞争对手。任何一个长期吃“老本”的民族,都会迅速地被其他民族超越。也正因如此,这段历史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具有特殊意义。

在这种竞争过程中第一个崭露头角的国家是葡萄牙而不是英国。它与西班牙一样,都是在与穆斯林的战争中开始成长起来的国家。这两个国家都临近海洋,拥有优越的航海区位条件。战争激发了人们探险的热情,而这种热情由于在临近的群岛中发现了大量的出产而变得更有吸引力。葡萄牙的领土面积远不如西班牙,但却由于西班牙的阻隔使它免去了对欧洲大陆事务的纠缠,反而更有利于其专注

于海外的扩张。由于在航海战争中得到的好处,葡萄牙人开始将自己的触角伸到可能的一切海洋要冲。不过,西班牙人很快也跟了上来。最大的事情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而葡萄牙人拒绝哥伦布的原因却在于他们拥有比西班牙更先进的技术,并计算出哥伦布的设想是错误的。然而,历史却让哥伦布“错误”地发现了新大陆,这真是一个谁也无法预测的结局。看来,敢于冒险对每一个民族而言都是一笔财富。发现新大陆并控制了东方至西方的香料贸易后,这两个国家都获取了几乎是天文数字般的金银财富,并使整个民族在一夜之间暴富。但这种轻易获得的财富并未给这两个国家带来持久的繁荣,因为源源不断的金银使国内的物价上涨,消费者更愿意购买其他欧洲国家生产的廉价物品,结果使本国相应行业遭受了沉重打击。尽管未能持续引领世界潮流,这两个国家还是在近代以来的历史留下了厚重的一笔:它们用探险和航海证明了海洋贸易的价值,并由此开创了一个人类的活动遍及全球的时代。

由于起步早,这两个国家日子过得太顺,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体系变革和社会变革,反而对国内的工商手工行业的人员任意掠夺。结果这些从业人员都跑到了有议会的荷兰,使荷兰的国力迅速强大起来。加上荷兰地处欧洲北部的商品集散地,所以,荷兰人很快靠商品贸易崛起了。荷兰人重点发展自己庞大的商船,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队,几乎完全垄断了世界海运业,荷兰人因此被称之为“海上马车夫”。但荷兰人的霸权并不长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国土不大,未能很好地发展自己的商品生产行业,地理位置也不如英国有利。莫德爾斯基认为,一个能够长期成为领导的国家必须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有利的地理位置,或许是能够超然海外的海岛型国家;第二,具有一个有内聚力的,开放的,有联合能力的社会;第三,有领先的经济;第四,有能够全球投放的政治战略组织能力。^①

从这个角度看,英国显然是最有利的,它可以很容易控制不列颠群岛并作为自己实施世界政策的基地。英国面对欧洲诸国的角力,可以很巧妙地使自己置身事外,并且在新的机遇面前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内部关系,议会在与国王的斗争中占了上风,法治体系开始进一步完善,科学和技术也得到了迅速地发展,产生了牛顿这样的大师,而这一系列变动由于新航道开辟的商业机遇和对外战争最终激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英国能够大量地供应自己生产的商品,结果,工业的英国最终

^①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pp. 12-13.

战胜了商业的荷兰,并使英国牢牢地占据了世界发展的主导者的地位。从创新的角度讲,议会制度与工业革命是英国的两大成就,由于这两大成就具有一种制度性的功能并成为其他国家可能效仿的榜样,其创新度远远高于它的邻国,所以使英国牢牢地主宰了世界发展的潮流几乎达两个世纪。

法国与英国的竞争则长达数个世纪。法国资源与人口都远远超过英国,并且也拥有良好的海港,因此,17世纪的法国一直在欧洲大陆采取一种咄咄逼人的政策,四处扩张。然而,法国人却并不十分幸运,他们尽管雄心勃勃,不甘人后,却总是不大顺利,从未拿过冠军,在世界历史的竞争中老是屈居第二。这种命运与法兰西民族本身的社会结构有重大关系。法兰西的社会发展程度不如英国,所以其专制势力受到的约束很小,其结果是在发展过程中,全凭统治者本人的明智来主导发展,路易十四的辉煌证明了这一点;而一旦遇上不称职的领导者,就会发生大的社会危机。法国革命是彻底的,也是空前猛烈的,其时间跨度之长十分罕见,结果固然推翻了专制统治,为法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却也因此丧失了超越英国的机遇。法兰西民族的历史证明,长期的革命或者内乱,最终是有利于自己的竞争对手的。当然,法兰西民族的创新精神依然不容忽视,它在激烈的新旧制度冲突中体现了三权分立与人民主权等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的正义与合理性,而《拿破仑法典》更是将依法治国的原则具体化并开始成为一种普世原则。拿破仑自己认为《拿破仑法典》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他的一切战功,并将影响整个欧洲,不仅是对他自己,也是对法国人对世界贡献的一种正确评价。

而现代德国的发展更为独特。其优势是位于欧洲交通的十字路口,有利于德国和东、西、南、北欧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广泛的交流,把整个欧洲的发展汇成一片,这不仅对德国本身有利,也对整个欧洲的发展非常有利。在带来优势的同时,这种地理位置也给德国带来了无尽的烦恼。正如俾斯麦所说,“上帝已经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位置,我们的近邻不允许我们在只求苟存的泥潭中打滚”。欧洲某些国家和地区之间一旦发生矛盾和冲突,就会迅速蔓延到德国,甚至会使德国变成矛盾和冲突的焦点。由于这种劣势,使各种资源极为丰富的德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未能很好地发展。同时,英国、法国和俄国这些欧洲大国都不愿意看到中欧出现一个强大和统一的德国。在几个世纪中,这些大国外交的基本政策就是阻止中欧出现一个统一和强大的国家,其结果是分裂导致了德意志的软弱和经济发展迟缓。但德国终于在19世纪中期由俾斯麦抓住机遇,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在不到10年之内

迅速统一了德国,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并利用第二次工业技术变革的机遇,发展基础教育和技术教育,使德国后来居上,成为了欧洲一流的强国。设若德国没有在一个稍纵即逝的时期内完成统一,抓紧发展,那么,整个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可能完全改写。德国的失误是没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稳步推进政治发展,以至于最终让希特勒这样的人物上台并给欧洲和自己的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德国在竞争中的创新依然是巨大的。德国重视基础教育,以国家意志把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建立了现代的高等教育体系,当今的研究生制度和实验室制度均来自德国,而雄厚的基础研究能力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使德国制造的高品质,至今依然享有盛誉。更重要的是,德国首次由李斯特提出,发展是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发展,而不是以世界为基本单位的发展,而一个国家的发展关键是要发展其具有长期效应的基本生产能力,甚至为了这种生产能力的形成而放弃那些短期的经济利益。这些思想,不仅影响了德国,也对其他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落后大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而参与这种竞争的国家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国家复合体。俄罗斯的现代发展道路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处于东西方之间的俄国,由于彼得大帝抓住机遇向西方学习,部分改变了俄国的社会结构,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制度,使俄国终于超越了其他的东方古国,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发展过程。俄国也处在一个有利的地缘位置上,尽管西方有强敌,但东方却都是相对落后的国家,所以俄国得以向东方抢占大片的国土,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大国地位。但俄国建立的胁迫式发展模式存在着致命的弱点。这种胁迫式发展模式虽在一段时间内颇为有效,从长期来看,其存在的弱点使得俄国既不能或不满足国内民众的权利或利益要求,也不能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但是,俄罗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自己独特的创新,尽管是一个资源丰富,国土辽阔的国家,俄罗斯却始终具有强烈的危机感,并为了应对这种危机不断地寻找对策,向更先进的国家学习。俄罗斯不计功利地发展基础教育,将教师的地位抬高到一种神圣的位置(所谓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俄罗斯人对真理的一种宗教式的追求,普通人对读书所具有的一种学者式的激情,毫无疑问是俄国在学术和工艺方面能够独立取得重大成就并能单独对抗西方阵营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一个基本因素。

在 15 世纪以来的大国发展过程中,美国是最为顺利的。美国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立国之后短短的 50 年内,它的人均国民收入就超过了法国和德国,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内它就赶上了曾经是它的母国——长期执世界经济

之牛耳的英国,夺取了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宝座,这应该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奇迹。美国的成功当然有很多因素,但关键的是抓住了两次难得的机遇:第一是19世纪利用列强无法涉足西半球的空间优势,通过南北战争调整好了内部的关系,奠定了自己工农业发展的基础。第二是充分利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机遇,吸收欧洲国家的资金和科学技术人员,使自己由欧洲的债务国成为了债权国,由文化沙漠成为科技重镇,并在二战后利用冷战搞垮了最后一个主要对手苏联,爬上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霸主位置。除此之外,美国当然有自己的创新。按一些美国学者的看法,美国最重要的创新就是美国1787年宪法,这个宪法不仅保障了美国人基本的权利,还使在这种基础上的社会体制既能充分激发出每一个人的创造激情,又能包容创新者的失败。这种美国式的自由,使美国社会内部永久性地充满了竞争,并且这种竞争氛围还形成了一种美国式的危机感,即美国在最顺利的时候也不断地寻找新的目标,“寻找新的敌人”或是对手,迫使自己发奋努力,这固然使美国有时十分霸道,并给世界带来了不安,然而从一个民族发展的角度看,或许不能不说这种心态更有利于保持一种长期进取的精神。

日本作为唯一的一个非西方、同时也是非基督教文化的国家而挤入近现代大国的行列,完全是一个例外,这种情况在近现代日本历史上出现过两次。两次都是日本在几乎无望的形势下,挤进了发达国家的行列。第一次是日本19世纪50年代被迫打开国门,在很有可能沦为西方殖民地的情况下,能凭借有利的国际环境,实行了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改造,引进西方的思想和技术,通过战争手段强行地楔入了大国的行列;第二次则是在二战后,由于战争的蹂躏和战败的惩罚,日本再次失去了大国的地位,但是随着国际环境的变迁,日本又借助于战后变换的国际格局和自身地缘政治的优势,在追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的同时,专注于经济的发展,最终凭借经济实力再一次崛起,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的成员。但日本没有对传统的封建东西进行应有的清除,它的军国主义给自己的邻国带来了灾难,也使日本在二战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所以,日本是一个经验和教训都十分突出的另类例子,就创新的角度而言,日本人办事和学习的“死认真”以及团队协作的精神,见先进就毫不迟疑地拿过来为我所用的务实精神,对其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上述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构成了这本文集第二部分的内容。而第三部分的内容,主要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有关,因为我们学习他人的东西,最终希望能对我们自己的发展有所启迪。现代世界的发展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逐步

转变的过程,但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因而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的工业化就主要是从其社会自身不断产生出有利于工业化的因素来实现的,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在既无外来压力,也无政府指引的条件下,自发地产生和进行的。英国的这种现代化模式一般被称为内生型的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模式,而后起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是模仿型或应激型的。它们几乎不可能按照英国的模式而实行宽松的自由放任政策,因为这样就无法有效地动员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并对其进行合理配置,调节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时出现的紊乱失调现象,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

由于晚一步启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绝不可能一帆风顺。甚至与德日等国相比,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形势与它们起步时也已经有巨大的差别。世界经济秩序中的弱国地位,使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经济方面无法重复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发达国家已经控制了世界市场的主导权,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它们几乎不可能获得与发达国家“平等”的发展机会,而这种后发展态势造成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性。这种不完善表现在其市场的结构与运行不完善,商品与要素市场通常组织得不好,扭曲的价格通常是对经济信号和经济冲动的一种反应而不是对社会与这些服务、商品和资源的真实成本的反应。因此就要求政府重组市场并在调控价格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这种扭曲的价格信号也会使政府和社会不能做出适当的投资决策。因此,假设没有政府对资源分配的干预,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对社会获得最佳效益是不利的。这种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不完备性使人们更加强调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 1970 年也认为,“政府不能够也不应该在工业扩张的过程中只起被动作用。计划已成为工业发展纲领中一个基本和完整的组成部分,因为市场力量自身不能克服发展中国家经济中那种很深的结构性僵化”。^① 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尽管重要,在发展中国家却不能等待市场机制“自发地”推动工业发展,必须依靠政府的作用来推动发展。实际上,即使是英美这类的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国家对市场完善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在这种意义上,市场并不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存在的,它

^① Michael P. Todaro,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gman, 1994, pp. 568 - 569.

的存在和完善也取决于人类社会有组织力量的引导。

由于政府在发展过程中的这种作用,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也就自然成为了落后国家发展的关键问题。

以阿尔蒙德为首的学者,认为政治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的发展,二是国家的民主化。前者是指国家政权吸收社会各种资源的能力,保障社会稳定的能力;后者则是指社会普通成员参与决策的程度。从内容上看,政治发展首先应该包括政治民主的进展,因为在各种封建制度下也曾建立过十分有效的政权,所以如果离开政治民主化谈政治发展似乎很难令人理解。事实上,在最初关于政治发展的研究中就是将政治发展等同于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其次是政治稳定,这也被认为是政治发展的目的之一。而政治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又与以下几种因素有关:政治文化,也就是说人民对政治和政府,特别是对政府的合法性以及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所具有的价值、态度、倾向性、神话和信念。政治参与,人民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的性质和规模。政治机构,也就是说社会通过它做出权威性决定的正式组织的性质,即这种机构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程度以及派性和官僚主义机构的相对重要性。政治一体化的程度,也就是政治不以种族、宗教、阶级、文化或领土界限截然分开的做法为其特点的程度。而最重要的,是政治发展要达到一种建立在民主决策基础上的政治稳定,要有一个能有效地执行发展任务的强大政府。换言之,后发展国家要想有效地进行工业化,就必须在政治方面取得相应的进展。

而这种政治发展能否达到预定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该国的政府是否很好地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如果对经济发展作一个简要的定义,那就是在一定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经济质量的有效提高,由此一切有关于国民的富裕、收入的合理分配、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作用问题便自然地成为一国政府所要解决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其国家的总体资源十分有限(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如何利用这些有限的资源来进行经济发展,又成为政治发展的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从某种程度上讲,民主化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民主化处理不当又会加深社会矛盾。首先,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工人、农民、消费者团体,地区居民团体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为了索取“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利益”或维护自己集团利益而开展的民主运动,很可能使各阶层之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或不同部门之间发生利害冲突和产生矛盾。要解决民主化过程中的经济问题,需要反映多种利益集团的不同要求

和利益,很耗费时间和财力,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错过解决紧迫问题的机会,在解决全盘经济问题时,很容易使分配问题优先于效率问题,很容易导致利益集团之间瓜分式的解决办法。韩国经济学家朴英哲在其著作《漂流中的韩国经济》中写到,韩国经济失去动力和活力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民主化过程中开始激化的索要自己那一份的运动导致部门之间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①

其次,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解决经济问题容易产生重视舆论而忽视专家观点的倾向。一些政治家为了获取选票和舆论的支持,试图用短期观点解决问题而不是用长远的观点解决问题。这样复杂的经济问题很可能被舆论所左右,很容易由不是专家的政治家根据“群众”的喜好或舆论来决定政策,使之成为迎合型的政策。

第三,很难执行正确的财政金融政策,民主化浪潮可能迫使政府为了迎合各阶层的欢心增加财政支出,减少税收。因为减少财政支出,提高税收通常是不得人心的,但是这种政策会导致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增加又会引起利率上升,并导致通货价值的上升,而其后果是引起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贸易赤字增加,所以,民主化浪潮带来的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

第四,导致经济的不稳定,韩国在大选中,为了广泛的民主选举,全国动员了 80 多万选举工作人员。结果是把大量宝贵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非生产性政治活动,而且数以万亿韩元的选举基金,增加了引发通货膨胀的危险,各种与民主化有关的活动和选举一个接一个,极大地危害了经济的稳定。

第五,民主化过程可使资源分配发生扭曲。由于民主化将大量的人力资源投入到非生产性政治领域,其结果,国家的大量资源流入到政治产业,流入服务业而削弱制造业,这是十分危险的。民主化进程过快,经济衰退,反而使卷入民主化过程的国民感到所得甚少,产生被剥夺的感觉,引发新的不满。

从世界各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看,在上个世纪,不仅德国和日本未能依靠民主化来推动自身的发展,就是在整个 20 世纪,也没有一个国家是靠民主化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各国都是靠中央集权式的经济运作方式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巴基斯坦曾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后来却因为民主化将其拉回到原来的状态。^②

从上面这些例子,就表明如何处理好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难题,

① 李庆臻、金金龙:《韩国现代化研究》,济南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 页。

② 李庆臻、金金龙:《韩国现代化研究》,第 31—32 页。



但总的来讲,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应将建立一个稳定有效的政权放在首位,只有在经济发展到达一定的阶段后,才有可能真正进入民主化的改革。如果将位置前后颠倒,很可能适得其反,毁掉一个国家已经取得的现代化成果。

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利益协调,处理好社会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在尽可能减少内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目标。而英国在发展过程中法治化、民主化、社会保障制度化的现代化顺序,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自有其十分现实的意义。

当然,发展中国家的政党问题、腐败问题,各种产业发展的协调问题,乃至土地问题、民生问题,都是应该关注的内容。此外,发展中国家能否有效地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能够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也是一个未能解决好的难题。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其发展道路的复杂性,显然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不是在历史的真空中发展,它只能在当今世界各种力量相互角力的格局中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发展不可能是任何一种理想化模式的翻版,也不可能是某种经典理论的注释,而只能是一种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求最大包容度的发展模式。由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和国土规模(中国人口超过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以及中国具有悠久历史传承的特点,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必然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模式,探索与实践这样的模式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是一种幸运,我不敢奢望自己的这些文章能对祖国的现代化事业有多大的助益,惟愿在回首往事之日,能为自己在祖国昂然前行的惊涛骇浪中没有做一个旁观者而聊以自慰。

谨以此为序。